

黄道婆籍贯之争的人类学思考

谭晓静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为了实现利益需求,上海和海南分别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背书”、大众媒体宣传以及民间大众自觉接受的多方参与的利益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政府、学者和大众媒体侧重于功能性利益的追求,民间大众更多的是追求情感性利益。

关键词: 籍贯之争; 利益认同; 黄道婆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433X(2011) 02-0065-04

我国古代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籍贯之争,只因陶宗仪称“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1]和王逢称“黄道婆者,上海松之乌泥泾人”^[2],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和争论的契机。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学术争鸣,也有政府行为。黄道婆籍贯之争实际是文化资本的竞争。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已经作为一种资源发挥作用,因而已经变成现代社会中新、独物的分化根源。他认为,文化资本是被有能力大量积累它的少数人垄断,以物以稀为贵的方式获得利润和效力^[3]。据此,上海和海南都通过政府、学者以及大众媒介的宣传等方式来争取黄道婆文化资本的绝对拥有权。在竞争过程中,各方参与群体表现为强烈的利益认同,并极力维护区域利益。这种利益认同分割了黄道婆文化^①的整体性,不利于黄道婆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一、黄道婆籍贯之争的渊源

记载黄道婆的典范文献仅两则,一是元代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徙居松江时撰《辍耕录》,其中有许多与元代社会相关的历史、文学、科学资料。其卷二十四载:“国初时,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全文不超过300字,主要记叙了从崖州来到松江的黄道婆传授棉纺织技术及革新纺织工具,促进了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侧重于她的贡献。该文献是学界普遍认为最早

记录和宣传黄道婆生平和功绩的文本。另一则是元代诗人王逢《梧溪集》(卷三)载有诗《黄道婆祠并序》:“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全文也不过300字,该诗是在张守中把黄母祠迁建到自己祖坟的南面时,邀请王逢为祠作序。

需要说明的是,两则文献都是在黄道婆去世后所记录,两作者都是元代徙居松江之人。尔后,出现的史志文献,诸如《松江府志》、《上海县志》等都是从陶和王两文中进行了选择和取舍。

1. 黄道婆记忆在上海。黄道婆的历史记忆在上海一直是连续的,各个时期都有文献记载,其祠堂、塑像、墓地历次修复。20世纪80年代,国家大力提倡历史文物保护,1986年12月8日,上海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其历史文物古迹的依托下,黄道婆墓亦是保护对象之一。1987年11月17日,黄道婆墓被上海市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凸显黄道婆在上海历史名城中的“名人效应”,由政府部门组织了三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1989年9月,由上海市文管会组织了第一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其主题就黄道婆身世、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意义等展开了深层次讨论。1991年12月,由上海市文化局主办,在徐汇区龙华乡举行了第二次黄道婆学术研

收稿日期: 2010- 05- 12

作者简介: 谭晓静(1975-),女(土家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问题。

① 黄道婆文化,即黄道婆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两个层面。具体来说,它是海南黎族棉纺织技艺与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有机结构的物质文化,以及她勇敢好学、刻苦钻研、大胆革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文化的总和。黄道婆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行业性和传承性的特点。

讨会。此次会后,上海市文化局将前两次研讨会论文进行了整理,出版了《黄道婆研究》一书。2006年11月16日,由徐汇区人民政府和东华大学主办了“黄道婆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的8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黄道婆革新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研讨。会后又出版了论文集《被更乌泥泾名天下》。

三次研讨会的召开,使黄道婆在上海学术界由一个历史人物转变成成为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3月21日,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徐梅路700弄的黄道婆纪念馆建成开馆。世纪之交,世界吹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号角,这也为黄道婆文化进一步被挖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市徐汇区组建了以区文化局和华泾镇领导为工作小组组长、有关专家、教授加盟的工作班子,着手开展申报黄道婆及其棉纺织技术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工作,对黄道婆及其棉纺织技术进行全面保护措施。2006年,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2007年由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编《黄道婆——被更乌泥泾名天下》,是徐汇区中小的课外阅读教材,向新生代传授黄道婆相关知识,以期薪火相传,世代弘扬黄道婆精神。并在徐汇区的紫阳中学和园南中学,每周开展一次实践课,课程内容主要是熟谙纺织技艺的中年女性教授学生纺纱织布,通过学校教育,建构了集体记忆。2007年11月,吴春荣和陈珺珩著《黄道婆》的问世,及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编《遗产中国——黄道婆手工棉纺技艺》的即将出版,表明上海学术界对黄道婆的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笔者还了解到,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将拍摄黄道婆的纪录片,以更好的宣扬黄道婆精神。

2. 黄道婆记忆在海南。历史文献中除了陶宗仪的《辍耕录》记有“国初,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还有清代的钱大昕在《咏木棉诗》中写道:“崖州老母年七十,卓椎双髻头髻辈。传来上世种植法,至今立祠香茅庵。”^[4]清末李维清所著《上海乡土志》第五十四条载有:“黄道婆者,元时崖州人”。^[5]虽然钱大昕和李维清均以陶宗仪的记载为蓝本,但也为海南人在争论中增添了几份自信。

沉寂了多年的海南,终于有人站出来指出:“黄道婆崖州人也”。已故的原崖县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副局长、广东民族研究会理事周振东先生,先后撰写了论文《关于黄道婆出籍问题的探讨——兼与杨嘉佑同志等商榷》^[6]、《黄道婆籍贯考辨》^[7],文中对陶宗仪《

耕录》和王逢《梧溪集》两文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文本体例以及两位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治学态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诠释,认为陶宗仪的记录更可信,即黄道婆是崖州人而非松之乌泥泾人。在周先生的启示下,有学者到海南三亚崖城搜集整理了黄道婆的民间传说。乐东黎族自治县福报文化站的陈斯林整理了《黄道婆在水南村的传说》,传说黄道婆是崖州(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的黄家汉族女儿。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保定管区王开资整理了《黄道婆在保定村的传说》,传说黄道婆是崖州南水村黎族女儿。继“传说整理”之后,2005年《崖州民歌》中,苏传盛编写的“崖州织女——黄道婆”^[8],称黄道婆为崖州黎族妇女。此民歌唱出了黄道婆学习、生活、传艺不平凡的一生。2006年由海南大学的周伟明等人负责主编再版的系列史志中,如《正德琼台志》(明)、《康熙崖州志》、《乾隆崖州志》、《乾隆琼州府志》、《万历琼州府志》等分别转载陶宗仪的原文,使黄道婆真正走进了海南史志。2007年5月31日,崖城镇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由林葆玉编写的《崖州历史文化展览图文集》在介绍黄道婆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依据陶宗仪的“自崖州来”,称崖州山水孕育了黄道婆,她将家乡崖州的棉纺织技术带到松江一带进行传播,侧重强调她的贡献。同时,修复了“崖州学宫”,宫内有诸如黄道婆、洗夫人、鉴真和尚等文官武士的雕像,给海南人建构了另一种集体记忆。

2009年7月26日,由三亚市政协主办的“黄道婆在三亚”的学术研讨会使“争论”明晰化了。此次研讨会的论题是“黄道婆是三亚黎族织女”,参会的专家学者的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论证了该命题。召开该会的目的是挖掘、整理黄道婆文化为三亚发展旅游业、提高城市品位服务,借此让三亚实现由旅游文化向文化旅游的转变,希望黄道婆这一国际著名历史人物能打开三亚旅游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2010年4月30日,三亚市政协又主办了创建“中国衣食父母主题公园专题研讨会”,会上50多名国内学者专家主要围绕如何创建主题公园进行研究和探讨,该会实际上属于项目论证报告会。但它却向世人宣告:三亚将要建造黄道婆纪念馆,黄道婆文化在三亚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黄道婆籍贯之争中的利益认同

我们所知道的典范文本是被社会中部分人或人群所选择、强化、宣布的历史记忆。在生存资源的角逐中,这些记忆便成为各社会群体以及各次群体间的一种争论与政治经济谋略的运用^[9]。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知识分子王逢与处于优势群体的王守中“合谋”写

下《黄道婆祠并序》开始,在上海人、海南人乃至全国人民,都被迫接受了黄道婆就是上海松江人的记忆。在尔后上海的各种史志文献纂修乃至教科书的编写中都以此为典范,不断地强化了这种历史记忆。笔者在上海和海南调查中发现,只要是读过书的人都知道,黄道婆是上海人,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都说历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如果国家不提倡历史文物的保护,不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不宣扬历史名人文化提升地域品位;如果世界不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不需要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等等,那么海南人也不会去翻“旧帐”,找到陶宗仪的《辍耕录》,告之世人:“黄道婆自崖州来”。这就是王明珂强调的,历史记忆使各社会群体为满足利益需要而引发资源竞争成为可能,在资源竞争中导致利益认同的发生。在黄道婆籍贯之争过程中,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利益认同。争论双方为了获得黄道婆文化资源的绝对拥有权,而各自为阵,自寻发展契机。换句话说,这种争论割裂了黄道婆文化的整体性,不利于该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通常情况下,利益认同是指人的物质、精神利益需求方面的一致性和统一性^[10]。人们在进行利益追求时总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功能性利益的追求;二是情感性利益的追求。同时,利益认同的实现又必须遵循两个条件:一是思想共鸣;二是行为互动。换言之,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体现出人们的理性选择,而精神需求的满足则透视着人们的非理性选择。为了实现利益需求,上海和海南分别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背书”、大众媒体宣传,以及民间大众自觉接受的多方参与的利益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政府、学者和大众媒体侧重于功能性利益的追求,比如上海为凸现历史文化名城的悠远历史和深厚文化,需要“黄道婆名人效应”的点缀。海南为了国际旅游岛的建设,需要黄道婆的社会注意力来吸引国内外旅游人关注三亚,以实现经济利益。基于民间大众来说,他们更多的是追求情感性利益,只因黄道婆为地方名人而骄傲和自豪。在争论的过程中,各方群体产生了共享利益的高度认同,并有极力维护该利益的强烈愿望。

在与上海争论期间,海南学术界首先提出“黄道婆是海南崖州人”,一改“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的历史记忆。同时一些学者在三亚市崖城水南村、南山村做调查时,把自己编好揉进自己倾向性的传说故事讲给当地民众听,以唤醒他们的记忆。随着黄道婆研究的热情日渐高涨,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一次又一次地去访谈,便强化了当地村民对黄道婆的记忆。特别是三

亚政府举办的“黄道婆为崖州黎族织女”研讨会后,通过大众媒介的宣传,使得更多的人知道并逐渐改变着原来的历史记忆。由于陶宗仪只说黄道婆自崖州来,而并没有指明具体的那个村,后来学者都是依据“崖州”(今崖城)的地理位置进行推测,就有了不同的传说故事,重构了不同的历史记忆。南山村的村民告诉笔者,黄道婆是南山村的黎族女儿,水南村的村民称黄道婆为汉族姑娘。这是因为南山村是黎村,而水南村的居民全为汉族。总之,不论是水南村还是南山村,黄道婆只要是崖州人,他们就为此而自豪和骄傲。在对非崖州的黎族访谈中,没读过书的60-70岁的老人根本不知道黄道婆是谁,读过书的30-60岁的人对黄道婆的记忆来自书本,其中除一些先觉者,比如槟榔村的乡村文化旅游公司的LHD总经理,他对黎族文化有一些研究,参加了政协举办的两次会议,他就力争黄道婆为崖州黎族女性。而20-30岁的年青人正逐渐改变着自己的历史记忆。由于记忆意味着对过去的延续、想象和重构,故当人们把历史当作一种被附加意义的历史,当作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产物时,就意味着人们并不总是想关注过去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11]。他们关心的是历史对于现在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过去的历史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记忆成为社会事实后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12]。从这种意义上讲,在所有被调查者中,他们并不在意黄道婆到底是崖城那个村的人,而更在乎她将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传播到松江,成为著名历史人物,就是他们的荣耀和骄傲。由是观之,学者的研究和大众媒介的宣传给民间大众置入了新的记忆,而使他们自觉地改变着原有记忆。这里体现出一种思想上的共鸣,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可,最终达成利益一致性的认同。只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黄道婆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何种程度上的好处,故而只能进行情感利益需求的选择。

上海政府通过举办三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修复黄道婆墓、修建黄道婆纪念馆;学者就黄道婆学理研究成果的大量问世,以及大众媒介的广泛宣传等手段,试图固化原有的历史记忆,加强各方群体的利益认同。但面对海南提出“黄道婆为崖州黎族织女”的挑战,却表现出强烈维护本土利益的夙愿。笔者对上海东华大学某纺织史学家THX教授进行了访谈,谈到黄道婆的籍贯问题时,他非常坚定地说:“黄道婆就是上海人。”又问:“那您怎样理解陶宗仪的‘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呢?”他回答:“没有想过,历史记载黄道婆就是松江乌泥泾人。”这次不再坚决,有些底气

不足了。同时,他对海南黄道婆文化的建设表现出不赞同、无所谓的态度,又认为是两个范畴的文化。THX 现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申报的评审专家,为了申报“黄道婆与乌泥泾棉纺织技艺”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们正在筹划拍摄纪录片。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DH 老师就“黄道婆文化的争论”如是说:“不只是上海与海南争黄道婆,松江区与徐汇区也在争,关键是看谁走在前头,谁举办的活动多、组织学者的力量大、政府支持的力度强、宣传的面最广,就最有说服力。”他还告诉笔者,松江区没有多少关于黄道婆的“东西”,只因历史记载的昔日松江而非今松江,因此对于松江如何挖掘打造黄道婆文化,他们并不担心会有超越。但他认为海南有很多黎族的纺织文化可深挖,语气中有几份担忧。徐汇区华泾镇东湾村50岁的李先生非常自豪地告诉笔者:“上海人都知道黄道婆,马上要开世博会了,地球人都将知道黄道婆。”可见,不论是学者、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民间老百姓都在竭力寻求维护原有利益的方法和手段。

三、小结与反思

黄道婆文化在上海复兴是基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表现为政府带队,学者论证的套路。而海南则是在该过程中受到启发后的一种文化自觉诉求,表现为学者先论证,政府行为滞后的模式。双方曾希望通过合作,达到共赢,但结果却没能找到共同发展的切入点。据笔者调查,海南方有多批人员来上海调研,想将黄道婆墓移回海南,最终没有如愿。而上海方也有工作人员去海南考察,希望与海南方合作,共同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已于2009年10月申报成功,而“黄道婆与乌泥泾棉纺织”还在努力筹备中。由此观

之,黄道婆籍贯之争的背后实际是文化资本的竞争,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文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文化资本因稀缺而显珍贵。因此,历史名人文化资本在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激烈竞争已成为当下中华大地上的一道风景线。如从炎帝、尧帝、舜帝到老子、姜子牙、董仲舒、诸葛亮、曹雪芹、董永都成为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个地方竞争的文化资本。黄道婆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其中。上海为了体现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悠远历史及深厚文化,通过修建黄道婆纪念馆、先后三次召开黄道婆学术研讨会、拍摄黄道婆电影、纪录片、出版书籍、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手段复兴黄道婆文化,固化了上海人对黄道婆的认同,实际是想完全占有黄道婆文化资本。而海南怀着依托黄道婆文化品牌提升三亚城市品位和发展文化旅游的设想,先后两次召开了黄道婆学术研讨会,并提出“黄道婆为海南崖州黎族织女”的论题,为修建黄道婆纪念馆寻求学理上的支撑(黄道婆纪念馆的立项、选址等前期工作已完成,计划2012年竣工)等方式重构黄道婆文化,修改了海南人的集体记忆,其目的也是拥有黄道婆文化资本带动海南旅游经济发展。总之,争论因利益需求而起,在争论过程中,导致各方参与群体的利益认同;争论的结果是分道扬镳,谁也不可能获得黄道婆文化资源的绝对拥有权。

由此,笔者建议,上海和海南应携起手来,而不是在宣扬黄道婆文化时只侧重与本土相关的内容,比如上海强调贡献,而海南侧重黄道婆艰辛学艺精神。如果双方能树立共生合作双赢理念,将各自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互补型的文化共生模式,于上海于海南甚至对社会的现实意义将会更深远。

参考文献:

- [1] 陶宗仪. 辍耕录: 卷二十四[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2] 王逢. 梧溪集: 卷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 张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34.
- [4]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282.
- [5] 黄苇. 方志论集[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219.
- [6] 周振东. 关于黄道婆出籍问题的探讨——兼与杨嘉佑同志等商榷[M]//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第一册). 1985.
- [7] 周振东. 黄道婆籍贯考辨. 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一辑)[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8] 海南九歌文化传授有限公司, 等. 崖州民歌: 第二册[M]. 北京: 中国文艺出版社, 2005: 257.
- [9]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96: 427.
- [10] 裴士连. 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功能的调适[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5(6).
- [11] 别尔嘉耶夫. 历史的意义[M]. 张雅平, 译. 北京: 学林出版社, 2002: 8.
- [12] 张伟明. 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05(8).